主编 钱锺书　执行主编 朱维铮

中國近代學術名著

ZhongGuo JinDai XueShu MingZhu

新学伪经考

康有为 著

朱维铮 廖　梅 编校

中西書局

中国近代学术名著

主编 钱锺书　执行主编 朱维铮

新学伪经考

康有为 著

朱维铮　廖　梅 编校

中西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学伪经考/康有为著;朱维铮　廖梅编校. —上海：中西书局，2012.8
（中国近代学术名著/钱锺书主编　朱维铮执行主编）
ISBN 978-7-5475-0288-4

Ⅰ.①新…　Ⅱ.①康…　②朱…　③廖…　Ⅲ.①经学—研究　②哲学思想—中国—清后期　Ⅳ.①Z126.1　②B258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54637 号

中国近代学术名著
新学伪经考
康有为 著　朱维铮　廖　梅 编校

责任编辑　张安庆　赵明怡
特约编辑　徐俊超
特约编审　李国平
装帧设计　梁业礼
出版发行　上海文艺出版(集团)有限公司(www.shwenyi.com)
中西書局(www.zxpress.com.cn)
地　　址　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(200023)
经　　销　各地新华书店
印　　刷　浙江云广印业有限公司
开　　本　890×1240 毫米　1/32
印　　张　14.375
版　　次　2012 年 8 月第 1 版　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　　号　ISBN 978-7-5475-0288-4/Z·002
定　　价　42.00 元

重版前言

朱维铮

《中国近代学术名著》丛书十册，于一九九八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，为繁体字直排本。现在重版，改由上海中西书局刊行简体字横排本。*

当年由我撰写的初版编者说明，关于编纂过程，交代如下："这套选编，设计始于一九八八年，由当时主持香港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创议。编辑设想、编纂方案和拟选目录，均经主编钱锺书先生审订，交由执行主编朱维铮组织实施。"

明眼人一看便知，这过程从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八年，凡十年，其中必有曲折。我的陈述没有虚语，但说得太简单，刊出后未免引出猜测和议论。

起初有种议论，以为钱锺书先生不可能同意任丛书主编。事实呢？一九八八年早春，我应邀赴北美两所大学承乏客座教席，途经香港，与正在振兴香港三联书店学术出版业务的董秀玉总经理兼总编辑，商讨她年前的一个提议，要我主编一套清末民初思想文化名著的丛书。她同意我用五年编成晚清编三十种的设想，随即由我以主编身份，与香港三联签订了出版第一辑十种的合同。这时董总又提出，为利于丛书在两岸三地发行，可请钱锺书先生出任丛书顾问。

没想到不久董总即告知，她专程赴京，将我起草的晚清编计划面请钱先生审阅，钱先生很感兴趣，并当场删去原拟选陈炽《庸书》一种。

我和钱先生素昧平生，此前在复旦大学曾两度受命筹办中国文化的

学术研讨会，均委托友人代邀钱先生出席，他均未莅临，而我仍将所编《中国文化》及国际讨论会文集寄请他过目。或因此，他对我稍有了解，当董秀玉女士请他担任我主编的《中国近代学术名著》丛书顾问时，竟慨然允诺。这使我很感动，虽在海外辗转数校，仍不断以函电敦请有关专家分担首辑十种的整理校点，自己也编纂较难的几种。

事情往往出乎逆料。大概在一九八八年初冬某日，董总致电给我，说是日前钱先生对记者发表谈话，内谓他已破例同意担任香港三联将出版的近代学术名著丛书的“主编”。董总深感署名处理为难。我以为钱先生可能记忆偶误，却对丛书在海内外被读者接受有利；至于我的署名无所谓。问题是合同已规定主编应对编纂的稿件负责审定，并撰写每一种的学术性导言，这对年已七十八岁的钱先生可能有困难。其后商定，有关责任仍由我履行。

岂知事情的变化更出意外。我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从德国转道香港回沪，董总谓丛书校点稿排印很快，要求我即写导言，以便陆续出版。不料仅过月余，便发生那场风波，影响所及，香港三联书店也改组。新调任的总经理和总编辑，都表示承认已签合约，但对我相继交付的书稿，包括每种的学术性导言，则于收到后预付合约规定的稿酬外，便搁置不予出版，理由是香港市场小，学术性书籍卖不掉。

怎么办呢？合约未改，我仍算主编，而我在学校勉强恢复教学秩序之后，除了带研究生，便全力逐篇从事导言的撰著。董秀玉女士已回北京三联书店任总经理兼总编辑。她关心丛书的出版，港方却答以等我将十篇导言交齐再议。她建议我将已改定的导言，径寄钱先生审阅。我依言寄出拟列为十种首篇的《汉学师承记》导言稿，不久即得钱先生委托杨绛先生代笔的复函，大意谓收到我的“大作”，将留下“学习”云。那信息很清楚，不否认也不承认自己与丛书编纂的关系。这使我想起他为台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湾版《钱著七种》所写的前言，内将他的作品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中的遭遇，称作“表示风向的一片树叶”（《人民日报》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八版），现在是否表明他还要看一看丛书的命运呢？其时约在一九九二年夏季，钱先生已逾八十，风闻他和杨先生都身体欠安。于是我函告董总，表示不再以书稿事打搅钱先生。这是我与钱先生仅有的一次书面通讯，当然此后也无缘识荆。

鉴于我早将十种书稿交齐，香港三联当局仍迟迟不予刊行，因而董秀玉女士遂通过购买版权，将十种改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。于是丛书晚清编历经八年磨难，总算提上问世日程。不知董总怎样说服了钱锺书先生，在一九九八年六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《中国近代学术名著》，仍署钱锺书主编，而我则署作执行主编。奇怪的还有香港三联当局，他们以高价将丛书版权售予北京三联书店，却又附带条件，须将书版交给香港三联，另换封面印港版五百部，就是他们估算的丛书在港台的销量。我对这种“生意经”感到寒心，从此不敢和这班人打交道。

丛书出版后，有位“钱学家”写信命我提供与钱先生的交往情形。我如实答以没有直接交往。岂知此君即作长文痛骂我学识浅陋，所编丛书十种均为劣质品云云。我不得不作文说明丛书编纂实相，建议这位图书馆学者，最好不凭臆测追究他人动机。此后被人称作专写“容安馆毁人录”的这位作者，便视我为仇敌，在所谓揭秘的“大字报”中，会莫名其妙地扯上我，骂我将丛书编坏了，却又不说坏在何处，可谓深悉诬人三昧。

《中国近代学术名著》丛书初版三千五百套，早已售罄。十多年来，多有朋友建议重印。钱锺书先生早已逝世。董秀玉女士也已退休多年。我于近年身罹沉疴，于是同意上海中西书局，接受李国平先生的建议，用简体字横排重版印行。

重版必须重校。好在当年参与整理点校的诸位学者，如今均成人文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。他们都为承担的成书的重校尽力。李国平先生还关注重版本的编辑发行。当初我撰写的十篇导言，出版后曾得读者商榷，现在除叙事数处略有修正外，余均依旧，至盼读者继续指正。

重排本署名，均依初版，以保存那段曲折历史。当然，仍须申明，全书由我设计体例，选定版本，通审校点，撰写导言，如有讹误不当，均应由我负责。

2011 年 11 月 28 日三改

---

* 其中《旭书(初刻本　重订本)》、《刘师培辛亥前文选》为繁体字横排本。

编者说明

《中国近代学术名著》的晚清编，主要辑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文学者的代表性论著，以期展现中国学术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异过程。

遴选的学者和论著，着眼于学说有新意，有己见，在思想的文化的或政治的领域，发生过深远的历史影响。

结集则不拘一格，以专题为主，每种或收一人一书，或辑一人多篇，或合不同作者的同题论著为一编。

编者对每种都做以下工作：选择底本，取原校较精的刊本；异本互勘，不偏信通行本或整理本；复核引文，凡原著约引节引而与出典差异较大者均出校记；重施标点，包括分段；编制索引，分人名、书名两类。

编者对每种都撰有导言，附于篇前。导言既重可读性，以助读者了解相关专题的历史实相；也重学术性，当然属于导言作者的一得之见。为行文简明，诸导言凡引证出处、考订史实或商榷疑义，均以附注形式陈述。

限于编校出版的条件，晚清编拟分辑刊行，初定每辑十种，先成先印。如可按设想出齐，当能略见系统性。

这套选编，设计始于一九八八年，由当时主持香港三联书店的董秀玉创议。编辑设想、编纂方案和拟选目录，均经主编钱钟书先生审订，交由执行主编朱维铮组织实施。

全编原定由两岸三地同时出版，因而版式定为繁体字直排。第一辑早已编成发排，由于种种缘故，长期不克面世。现由北京生活·读书·

新知三联书店和香港三联书店同时推出。

编者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处参预编纂的年轻同仁，感谢三联书店辛勤校勘的诸位编辑，同时期待高明指正。

编例

一、本丛书选辑十九世纪初至辛亥革命前的部分思想学说名著，每种均由编者予以校勘整理：

底本。以原刊为主，有不同版本者择善而从。

校勘。正底本排校舛误，兼正原作者明显笔误，并以他校核查原著引据正误。一般不作理校。除对校诸本择善而从者外，凡校勘改动处均出校记，以顶注形式见于同页。他校所得亦以校记出之，于正文不作改动。

节录。于篇题下注明，并于篇末注明节录出处。

标点。原刊本无标点或仅有旧式断句者，概施以新式标点。

分段。文言文论著均重分段落，以便读者。

注释。作者原注概从原刊。编者增注限于指出原著有关之人物年里仕宦著述等明显讹误，以顶注出之。

译名。中文译名及译文概从原刊。如原刊注有外文并有讹误，则由编者径予改正。为方便阅读，若干种书末附有新旧译名对照表。新译名均依中国大陆出版物的通行译名。

版式。概用繁体字，直排式。除涉及语言文字学说外，凡原刊古体字异体字，均改为通行繁体字。原作或有双行夹注，现均改为单行夹注。

索引。所选诸种均增编人名、书名两种索引，以便通检。

二、本丛书所选诸种，专著原作者序跋及他人序跋有参考价值者，予以保留，并移作附录。每种前均冠以导言一篇。

一九九六年五月

导言

朱维铮

一

康有为是晚清民主运动的名角。从一八八八年他以平民身份首次给清朝皇帝上万言书，到一九〇二年他在海外发表反对中国实行革命的公开信，那十四年间，他一直被盟友和政敌当作提倡改革的领袖。

确实的，在那个世纪交替之际，中国的民主运动，虽然人材辈出，未来的革命家们也已纷纷登台亮相，却还没有人能同康有为抗衡。他不仅发动过“公车上书”，主持过“百日维新”，策划过自立军起事，而且在从事实际活动的同时，留下了堪称等身的著作。人们可以说，没有梁启超，没有谭嗣同，没有唐才常，没有黄遵宪、汪康年等等大群志士仁人，康有为也许一件事都做不成。但人们很难否认，正是康有为，集中了从龚自珍、冯桂芬以来，绵延了半个多世纪的改革要求和理论，构成了一个体系。这个体系，在理论上也许很荒谬，经不起逻辑和历史相结合的验证，却是那个时代的实际运动能够接受的一种思想范式。

康有为构成的这个驳杂体系，包涵着对中世纪学说的否定，对消逝已久的古典传统的梦想，对未来世界的乌托邦式设计。代表性的著作有三部，那就是一八九一年发表的《新学伪经考》，一八九八年一月出版的《孔子改制考》，一九〇二年完成的《大同书》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二

关于康有为这个人，从一八九九年梁启超发表《康南海传》以后，百年来有关他的传记或年表，长长短短的已有许多[1]。其中不乏粉饰、溢美、辩解乃至神化之辞，还有种种待解的疑团，但如稍加整合，大体可知。

当一八五八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出生的时候，清帝国正面临存亡关头。太平天国虽已内讧，旗枪未倒，而英法联军占领了广州，还在向天津推进。咸丰皇帝在两年后便带着他的后妃大臣仓皇逃出北京。然而南海康氏家族似乎没受影响。康有为的祖父辈反而乘乱世发了家，好几人因参与内战有功而做了官。于是湘军首领曾国藩、骆秉章、左宗棠等，也就成了少年康有为最早崇拜的圣贤。

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，北方的捻军、南方的天地会也相继被清军消灭。帝国又暂时稳定了。但康有为的父亲在这时死去，他于是前往连州跟随担任州学训导的祖父读书。十一岁的康有为首次接触了邸报，开始对时政发生兴趣。两年后又跟随祖父到了广州，初见世面。十四岁回乡，又大读叔祖父的藏书，方知经史以外别有学问。虽因八股文蹩脚，不能博得一袭青衿，而备受家族责难，被迫埋首揣摩制艺，但仍然好观杂书。十七岁见到徐继畬的《瀛环志略》和世界地图，引起了解域外情形的欲望。

有关康有为的传记材料，都没有道及他何时成了生员。好在康家有财有势，纳粟入监并不困难。不知是否由此途径，十九岁的康有为首次参加乡试，但被黜落。也不知是否祖父对他失望的缘故，就在同年他被送到著名学者朱次琦门下，研习以理学为主的经史小学著作，前后三年。看来他对考据同样不感兴趣，因为他追求的目标是成为当代圣人。一八

七七年他二十岁，连州一场洪水淹死了他的祖父。他成了一家之长，于是在次年作出了退学决定。告别了朱次琦，跑回家乡入山面壁，沉思佛老的哲理。

正在他彷徨中，结识了回乡休假的翰林院编修张鼎华，“尽知京朝风气、近时人材及各种新书”，令他茅塞顿开[2]。于是出山去逛香港。正如当年魏源仅作香港一日游，便对这个英国殖民地的秩序钦佩不已那样，康有为在一八七九年初游香港，也对“西人治国有法度”[3]感到吃惊。从此他裁量中土是非，便换成了西方的，更其是英国的尺度。

一八八二年，康有为二十五岁，首次出广东，进北京，参加顺天乡试。结果还是落榜。他在沮丧中南返，途经古称繁华的扬州、南京游览。可能有香港作对比，他在扬州触目所感的是颓败气象。然而到了上海租界，却使他兴奋，以为这才是他的理想所在。在上海，他大买西书，回乡后便潜心研究，尤其留意西方的政治制度。次年他便在家中闹改革，立了个不裹足会，运用家长权威，首先禁止女儿和侄女缠足。

香港和上海的经验，使康有为如此迷恋，以致他逐渐萌生了一个古怪念头，就是在中国学西方不成的话，他便赴南美洲去开拓殖民地，实现他的理想秩序。这念头固然荒诞，却正好表明他向往的不是“复古”，而是“西化”，即资本主义化。回避这个事实，便不可能理解那时的康有为。

然而现实却不是中国人能否去海外建立殖民地，而是中国本土会不会沦为殖民地。中法战争再次尖锐地提出了这个问题。到一八八四年，战争已经断续打了十年，法军败多胜少。然而清政府却屈服于法国的恫吓，在次年撤回了坚持主权的边界谈判代表邓承修，另派李鸿章谈判“和议”。同年翰林院编修梁鼎芬，又因弹劾李鸿章卖国而被罢官。邓、梁都

是康有为的同乡友人。这使康有为更感到切肤之痛。“山河尺寸堪伤痛，鳞介冠裳知少多？”[4]“布衣老大伤怀抱，忧国无端叹有声”[5]。可能正是从一八八五年起，他便酝酿直接给皇帝上书。

经过三年犹豫，一八八八年康有为终于决定乘再次入都应试的机会，直接上书光绪皇帝，陈述时危，请求变法。不想碰了个大钉子，没有一名大臣敢给他转呈给皇帝不说，还被京中大小官僚非议指斥，因为他居然不顾清朝近二百五十年的先例，指望至尊接纳一名布衣的万言书，况且公然要求变革祖宗成法。他的那些同乡京官甚至准备开会公议，将他逐出北京。这使康有为既愤且畏，只得听从沈曾植、黄绍基等异乡友人的劝告，“勿谈国事”[6]，去搜集金石碑刻，登临万里长城。

但康有为不是那种轻易认输的人。正像中外历史上那些向传统挑战的人物一样，康有为也是自信得好像目空一切，顽强得好像执拗不堪，而且领袖欲膨胀到自我感觉“安石不出，如苍生何”的地步[7]。他上书失败，固然深感沮丧，但认定原因在于满朝文武都不是东西，“不独不能变法，即旧政风纪，亦败坏扫地”[8]。

这样的人物，很难避免自我迷信。康有为不是早以当世圣人自居吗？孟轲不是说过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”吗？纬书上不是记有孔子“端门受命”的故事吗？所谓无巧不成书罢，刚在上书失败后，康有为得知天坛祈年殿被雷击引起的大火烧毁。迷信的西太后慌了，赶紧表白从明年起还政光绪。同样迷信的康有为却乐了，他立即推算，祈年殿建成至今“五百年矣”[9]。不待说，年轻的光绪皇帝将是受命改制的圣君，而他康有为也被上天承认是“为汉制法”的今圣。

剩下的问题，就是像孔子那样作《春秋》了。可惜康有为一则尚未收徒讲学，二则尚未写出足同《春秋》媲美的巨著。

三

“已净万缘随念尽，更无一法与人言”[10]。一八九〇年初康有为回广州后写下的这两句诗，是丧气话，也是老实话。

例证可看他在这时改了又弃置的《教学通议》[11]。这部显示康有为早期思想矛盾的佚著，旨在论证社会改革应从教育改革入手。叙说劈头便称中国所以弱，在于朝野上下均无人才。那是逐点抄录七十年前龚自珍已说过的话[12]。叙说又称中国言教通治的出路，在于“师古”，而关键在于师古要“得其精意”。那又是龚自珍最佩服的王安石《上仁宗皇帝书》所谓法先王之政“当法其意”的回声[13]。古圣前修设学立教的精意何在？在《四书》中，更在《周礼》中。书中已在抨击刘歆，说是治经先要辨别今古之学。“古学者，周公之制；今学者，孔子改制之作也”[14]。但那非但是廖平在一八八六年发表的《今古学考》的见解，而且同全书杂糅今古、不别汉宋的多篇内容极不相称[15]。

可见，这时的康有为，已在构造他的体系，却正在难产中。因为他对中世纪经学的浅薄识见，使他没有能力进而打破后壁，正需有棒喝者相助，否则无“法”传人。

棒喝者已先到广州了。他就是廖平。这位四川井研人，是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所提携的门生，王闿运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所赏识的弟子。他从考据学入手，转而跟随王闿运研究经今文学，已逾十年。作为学者，他好新而胆小，因而在学术上，勇于自我否定，而怯于坚持己见。这使他一生论学总在变，总见解变了六回。一八八六年《今古学考》刊行后，受到批评和赞扬。张之洞不喜欢，而经学大师俞樾则深表赞赏。也许由于中

举人成进士给了他勇气，他决定弃旧说而创新论，否定《今古学考》“平分今古”的看法，进而“尊今抑古”，作《知圣篇》、《辟刘篇》。后者说《周礼》等古文经传多系刘歆伪造，前者说西汉今文经传才是孔子改制的创作。但一八八九年他应张之洞邀赴粤途中，在苏州谒见俞樾，略露改变见解的意向，便使俞樾“不以为然”，抵广州后又因《今古学考》而受张之洞申饬[16]。这使他不敢将两篇付梓。

康有为在一八八八年已从友人处借阅《今古学考》。待回广州，即主动去拜访廖平。首次晤谈似不顺利。据廖平说，当时他将《知圣篇》手稿给了康有为。康有为回去读后给了他一封近万字的长函，“斥为好名骛外，轻变前说，急当焚毁”[17]。此信已不存，但看过后来康有为与朱一新辩论《新学伪经考》得失的那些书信的，都不会否认廖平所述属实。廖平复函约期再谈，这回“两心相协，谈论移晷”[18]。他有没有将《辟刘篇》手稿交给康有为，还不清楚[19]。但廖平以下所言非虚：“明年，闻江叔海得俞荫老书，而《新学伪经考》成矣”。[20]

康有为的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，究竟是否剽窃廖平的《辟刘》《知圣》二篇，无疑是晚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。孰是孰非，史学家们聚讼纷呶，或许将继续到下一世纪。历史是最大的审判官，我们用不着替历史作出仲裁。但梁启超的证词值得重视。他一再说，康有为著成《教学通议》后，“见廖平所著书，乃尽弃其旧说”。[21]假如没有更原始的材料予以否证，那么廖平至少充当了康有为理论体系的助产士，是可以肯定的。

四

康有为在一八九一年颇为风光。去岁六月，著名的学海堂高材生陈

千秋前来拜门。八月陈千秋又引进梁启超来称弟子。梁启超十七岁中举,以举人拜诸生为师,其效可知。于是优秀青年接踵而来。康有为大得意,决定正式办学堂。校址选在广州长兴里,自任总教授总监督,命陈千秋任学长。写诗道:"圣统已为刘秀篡,政家并受李斯殃。大同道隐礼经在,未济占成易说亡。良史无如两司马,传经只有一公羊。群龙无首谁知吉,自在乾元大道长。"[22]

此诗表明,康有为已从上书不达的打击中缓过气来,而且得意忘形了。谁都知道"群龙无首"的原始宗教涵义。那时留下的《长兴学记》,是陈千秋整理过的乃师授课笔记。其中《周礼》不见了,唯有对刘歆"伪经"的攻击留存。这是谁的论调?不言而喻。长兴里学堂开学不到半年,《新学伪经考》便问世。全书十四篇,廿余万字,取材立论与《教学通议》大相径庭。廖平形容它成书之速,"倚马成书,真绝伦矣"[23]。略知做学问是怎么回事的,大概都很难同情康有为。

梁启超曾说,《新学伪经考》的成书,他和陈千秋"多所参与"[24]。从目前《新学伪经考》的再版本来看,虽然叙说删去了梁启超"赞助编检"的事迹,但"伪经传授表"上下和"刘向经说足证伪经考",都是梁启超代作,而《书序辨伪》出于陈千秋之手,则是康有为未能掩饰的事实。而在全书中勉强可说非蹈袭前人的另外二篇,《经典释文纠谬》和《隋书经籍志纠谬》,从其内容与梁、陈代撰三篇的关联来看,也很难说是康有为自作。

假如康有为的经学历史造诣能同他的政治野心相称,那么我们覆按他引用的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的史制,也许可以承认他还有些学问,从朱次琦三年至少通读过《史记》、两《汉书》等。不幸,我们覆按《新学伪经考》那些浩繁引证的结果,发现它们不是袭自龚自珍、魏源、廖平,便是袭自刘逢禄、陈寿祺、陈乔枞、顾櫰三、侯康等的著作。本书编者不拟逐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